

新六期 一九九九年五月

燕京學報

燕京研究院

北京大學出版社

燕京研究院

燕京學報

新六期

主 編： 侯仁之 周一良

副主 編： 徐蘋芳 丁磐石

編 委：（按姓氏筆畫排列）

* 丁磐石 王伊同 王鍾翰 伍福強

* 吳小如 汪馥郁 * 林孟熹 林 庚

林耀華 林 熹 周一良 侯仁之

* 徐蘋芳 * 夏自強 張芝聯 張瑋瑛

張廣達 * 經君健 * 程毅中 趙 靖

* 劉文蘭 * 盧念高 謝國振 * 蘇志中

（* 常務編委）

編輯部主任： 劉文蘭

編 輯： 江 麗 李月修 周漢益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五月·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燕京學報 新六期/侯仁之,周一良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5

ISBN 7-301-04121-7

I. 燕… II. ①侯… ②周… III. 社會科學-期刊 IV. C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9)第 10080 號

書 名: 燕京學報 新六期

著作責任者: 燕京研究院

責任編輯: 王春茂

標準書號: ISBN 7-301-04121-7/Z·0070

出版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北京大學校內 100871

電話: 出版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4140 編輯部 62752032

排版者: 北京軍峰公司

印刷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發行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18.625 印張 276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數: 0,001—1,500 冊

定 價: 39.50 圓

本學報出版承美國哈佛燕京學
社資助。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Journal has been financially assisted b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目 錄

中國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徐蘋芳 張光直(1)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護軍制·····	周偉洲(19)
《北史·恩幸傳》記齊宦者倉頭胡人樂工事雜說 ·····	黃永年(37)
明代道制考論·····	何朝暉(51)
明後期蒙古察哈爾部的南遷及其分佈·····	達力扎布(83)
漢文“西藏”一詞的來歷簡說·····	陳慶英(129)
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產生問題的兩則筆記·····	汪敬虞(141)
關於安陽小南海石窟的幾個問題·····	李裕群(161)
徐邈反切系統裏的重組字·····	蔣希文(183)
歲陰歲陽名義考·····	聶鴻音 黃振華(189)
《三俠五義》版本源流考略·····	林 薇(201)
“本天”與“本心” ——儒釋在哲學本體論上的區別及陸王心本論的特點 ·····	李存山 (221)
在史學上獨闢蹊徑的齊思和先生·····	蕭良瓊(243)
《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評介·····	高廣仁(257)
1996~1998 年中國考古學新發現述要 ·····	許 宏(277)
《燕京學報稿約》·····	(289)

Contents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	Xu Pingfang K. C. Chang(1)
The Hujun System in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Zhou Weizhou(19)
Notes to the "Biographies of the Emperor's Favorites" in the <i>History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i> : Jottings on Eunuchs, Imperial Servants and Foreign Musicians in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Huang Yongnian(37)
On the System of Dao in the Ming Dynasty	He Zhaohui(51)
The Southern Migration of Chahar People and Its Distribution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Dali Zhabu(83)
On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Term "XIZANG"(西藏)	Chen Qingying(129)
A Note on the Sprout of Chinese Capitalism	Wang Jingyu(141)
Some Problems Relating to Xiaonanhai Cave Temples at Anyang	Li Yuqun(161)
The Double Initials in the System of Fǎn qiē by Xú Miǎo	Jiang Xiwen(Xi-wen Chiang)(183)
Textual Researches on <i>Suiyin</i> and <i>Suiyang</i>	Nie Hongyin Hang Zhenhua(189)
A Brief Study of the <i>Three Chivalrous Swordsmen and Five Justice Fighters</i> :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its Edition	Lin Wei(201)
Tian as the Origin or Mind as the Origin	Li Cunshan(221)

Contents

Prof. Qi Sihe: A New-Road-Opening Historian	Xiao Liangqiong(243)
A Review of the <i>Integrated Studies of Chinese Archaeology</i> <i>and Historiography</i>	Gao Guangren(257)
The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in 1996~1998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es	Xu Hong(277)
Notice to Contributors	(289)

中國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徐蘋芳 張光直

壹 中國文明的形成

中國的歷史在秦代以前經歷了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和夏商周三代，約從公元前一百多萬年到公元前三世紀末。在這個歷史過程中，舊石器時代是極其漫長的。從一萬多年以來的新石器時代至夏商周三代，雖然占不到整個先秦歷史的百分之一的歲月，但它卻包含着氏族社會從母系向父系的演變，也包含着氏族社會向文明社會的轉變，還包含着夏商部族文化向西周華夏共同體文化邁進的歷程，以及秦始皇統一中國和漢武帝完成統一中國大業的全部歷史。這些重大的事件貫穿着中國秦以前社會歷史的全過程，形成了中國文明的特色，並直接影響着其後的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發展。

我們對中國文明形成的研究分析，是從歷史學和考古學的角度進行的，特別是考古學研究的成果，是我們研究分析這個問題的主要依據。

中國文明的形成是自身發展的，是土生土長的原生文明。

人類創造了文明，中國人創造了中國文明。

雲南祿豐臘瑪古猿的發現，說明亞洲也是人類發源地之一。雖然臘瑪古猿是否為人類的祖先，在古人類學家的研究中還有不同意見，但是，有可能作為

* 本文為《中國文明的形成》一書中的第九章。第一部份作者徐蘋芳，第二部份作者張光直。

人類發源地之一的亞洲中國，仍是值得重視的地域。目前在中國發現的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化石，都清楚地顯示他們與黃種人和現代中國人之間存在着連續性，有着親緣上的繼承關係^①。也就是說，中國人的祖先已在這塊國土上生活了一百多萬年，中國文明成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決非偶然。

中國舊石器時代人類化石和遺物的發現，以山西省芮城縣西侯度文化和雲南省元謀人化石為最早。西侯度文化以石片石器為特徵，包括石片、刮削器和砍砸器等，這種石器的打制方法，為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所繼承，形成了中國北方地區舊石器文化的特徵。中國南方舊石器文化諸如湖北鄖縣人、安徽和縣人和南京湯山人的石器卻是以礫石石器為主的文化。從舊石器時代開始，中國文化便表現出了南北不同的特色。

中國文明不論是農作物的栽培（北粟南稻）、家畜的飼養（以豬、狗為主）、蠶絲的發明、瓷器的創造、土木結構的建築形式、封閉式院落的布局、以政治功能為中心的城市、玉禮器和青銅禮器的使用、以形意為主的方塊字、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結構和祖先崇拜，等等，都說明中國文明是土生土長的獨立的原生文明。

二

農業的出現被稱為是新石器時代的革命，從採集漁獵到定居的農業社會，是人類知道用火後又一次改變人類生活的大事。

中國農業，根據考古學的發現，北方種粟，南方種稻。粟最初出現在西起甘肅東至山東的廣闊地帶，如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陝西西安半坡遺址、河北武安磁山遺址、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以及山東滕縣北辛遺址。它們的年代約在公元前 6000 年至公元前 5000 年之間。中國南方的稻作遺迹也有一系列的發現。時代最早的是湖南道縣玉蟾巖洞穴遺址發現的栽培稻粒，年代約距今 10000 年，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遺迹。澧縣彭頭山的稻作遺迹，年代約為公元前 7000 年。比它們稍晚的湖北宜昌城背溪、陝西西鄉李家村和河南舞陽賈湖等遺址，都發現了稻作遺迹，時代已晚至公元前 6000 年左右。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中的稻穀堆積最厚處可達一米，這是稻作已很發達的時代了，約在公

元前 5000 年左右。最近，湖南澧縣城頭山還發現了距今 6500 年的稻田遺迹^②。

中國農業北粟南稻的格局，是由於地理緯度不同，氣候不同，自然環境不同而造成的，大約以秦嶺和淮河流域一綫（約在北緯 33～34 度之間）為界。南北不同的情況，不僅表現在農作物的種植上，這和舊石器時代以來，在文化上形成的南北區別是一致的，而且一直延續到近現代。

中國以農業為本的傳統始於新石器時代。農業發達的基本條件是土地和耕作技術的改良與提高，與農業密切相關的天文、曆法、氣象、物候，以及農具之改進，便成為當時突出發展的科學技術項目。古代農業社會的人是靠天吃飯的，因而對天象的觀察十分認真，卜辭中已有關於天象的各種記錄；殷代已使用陰陽曆，一年十二個月，閏年十三個月^③。《夏小正》中所記錄的物候已相當精細，說明商末周初的人們已完全可以根據物候的變化來掌握農時^④。春秋時代首先把最先進的鐵金屬應用到農具上去，大大改進了農具的質量。戰國時代鐵農具的使用已相當普遍。

重農的意識還反映在對土地崇拜的社祀上，江蘇銅山丘灣商代末年社祀遺迹的發現^⑤就是一個明證。

中國文明發展的基礎是農業。手工業由統治者控制，主要為皇家和貴族服務。商業不發達，“重農抑商”是歷代王朝的一貫政策。這對中國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有極重要的決定性的影響。

三

文明社會是指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達到的一個文化發達的高級階段，是從無階級到有階級，從氏族到國家的階段，國家的出現是文明社會的標志。中國文明起源的時代是在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因此，考古學的發現和研究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中國考古學的研究表明：中國文明起源的要素，除了文字的發明，城市的出現，青銅冶鑄技術的產生之外，在中國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諸文化中，貧富的分化，等級的產生，代表人的社會地位和身份的禮器之出現，特別是玉禮器的制作，城市中政治和禮儀性巨大的壇廟宮室基址的發現，都是文明社會形成的極重要的因素。文明要素必須是反映社會之質的變化的。但是，文明起源和文明社會的誕生是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要經過一個很

長的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文明社會產生是一次社會性質變化的飛躍。所以，某個單項文明起源的要素可能出現很早，諸文明要素綜合發展導致社會性質變化，文明社會產生，則是後來的事情。這兩者是要加以區別的^⑥。

中國文明起源到文明社會的誕生，經歷了從仰韶時代晚期到龍山時代，大約兩千年的時間。蘇秉琦把中國文明的形成概括為“古文化、古城、古國”和“古國、方國、帝國”等不同的階段^⑦，有極重要的影響。夏鼐認為殷墟文化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但並不是中國最早的文明，中國文明的起源應上溯到二里岡文化和二里頭文化^⑧。目前，中國考古學界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意見，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從仰韶時代晚期，文明起源的要素逐漸形成，龍山時代則是中國文明社會產生的時代，特別是被看作可能是夏文化的二里頭文化，是崛起中原的最大的已經成熟的文明國家的遺存。

四

夏商周三代是中國古史上從傳說走向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代。夏代在考古學上雖然還是一個沒有完全揭曉的謎，但二里頭文化已經透露出若干“夏”的信息。這是中國考古學界應在最近時期內全力研究的重點課題。

在中國文明的形成過程中，商和西周文化具有重要地位。商代是有文字和有豐富的考古遺迹的第一個中國王朝。西周是繼商殷以後在中國文明形成過程中建立華夏統一文化的王朝。

商周文化在全國各地推進的情形，不論在歷史學研究上還是在考古學研究上都是一個新的重要課題。商王朝的統治是以武力為基礎的，卜辭中記錄的征伐諸方國的事可以為證。因此，商的政治勢力雖然已到達某些方國，但在文化上的影響卻並不深刻。西周王朝改變了商王朝的政策，加強了以血緣為紐帶的政治統治，以宗法分封制和姬姜兩姓聯姻的方式，構築了西周政權。在這樣的政治統治結構之上，西周王朝一方面安撫殷人，另一方面在分封諸國之地，把商的殖民駐防政策，改變為承認和容納當地文化，利用政治權力，搏鑄成了一個文化共同體，即華夏文化^⑨。這種政策上的改變，是基於西周提出了“天下”的觀念，它把上天視為普天之下的主宰，西周諸王是代表上天（上帝）執行統治的“天子”。認同和融合是西周王室處理與各方國之間關係的原則，這

在中華文明形成史上起到了巨大作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考古學上，商文化和西周文化與各方國文化之融合演進，呈現出了前後不同的景象。商文化在本土之外的擴展中，有兩種形式：一是商人征伐方國後的殖民文化，如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山東濟南大辛莊遺址和山東青州蘇埠屯貴族墓地，在這些據點上，商文化占絕對優勢，但也還殘留着當地文化的痕迹，如大辛莊遺址的“第二類遺存”^⑩，說明商文化在向各方國之推進中，有的並未與當地土著文化融合。第二種形式是，商文化憑藉着它的優勢向各方國施加文化上的影響，出現了當地土著文化與商文化融合的新類型。如江西新干商代大墓的發現，證明以當地土著文化和模仿中原殷商文化的成份占絕大多數，殷商文化的成份只占少數^⑪。江西吳城遺址也是受商文化影響的當地土著文化^⑫。同樣的情形還可以在四川廣漢三星堆祭祀遺址中看到，三星堆出土的玉器中，蜀人固有的玉器和仿中原的玉器占絕大多數，而中原的夏商玉器如牙璋、戈、環和琮等，只占少數^⑬；青銅禮器中既有中原商代銅禮器，也有蜀人模仿中原的禮器^⑭，這兩者之間涇渭分明。商在政治上雖已到達此地，但在文化上，當地的土著文化卻並未完全認同商文化，商王朝在文化上未能達到一統的局面。

西周文化與各方國文化之融合推進與商文化顯然不同，可舉山東古文化發展為例。山東在商周時期屬東夷地區，它有自己的文化發展序列：從舊石器文化開始，依次為鳳凰嶺細石器文化、後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或稱海岱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公元前十七世紀商人入主中原後，山東則為東夷集團的中心。商王朝在征伐東夷諸方國的同時，帶去了商文化。商文化是自西向東逐步推進的。魯北發現的遺址中的文化因素有兩種傾向，一是越靠西部的商文化因素越多，夷人文化因素越少；二是規格等級越高的遺址（如貴族墓）中，商文化因素越多，而一般遺址中則以夷人文化因素為主，甚至有完全是夷人文化的。這表示商文化首先在上層貴族（有些可能就是商人）中推進，而中、下階層則以保存固有文化為是。到兩周時期，遺址中的周文化因素大大增加，西周時夷人文化因素尚稍多一些，到春秋時期則明顯地減少，進入戰國時期後，夷人文化因素則融於周齊文化中而趨於消失^⑮。西周文化在向諸方國推進融合時，遠較商文化的推進為徹底。由此可見，周文化之演

進在中國文明史上是一個極關鍵和重要的時期，為秦的統一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五

中國氏族社會從母系到父系，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變，它大約發生於仰韶時代中期，完成在龍山時代。不論是母系或父系，它們都是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組織，血緣關係是氏族社會的基礎。父系的確立，使家族成為社會基本組織單位，為“家天下”的王朝統治鋪墊了平坦的路途。

中國歷史從氏族社會走向文明的國家社會，是在氏族社會父系確立之後轉化的，但文明社會并未破壞氏族社會以血緣為紐帶的父系制，相反地，卻把父系血緣紐帶與政治相結合，成為維護和加強政權的支柱。西周王朝更以血緣為紐帶組成宗法制，並以姻親聯盟和分封諸國的封建制，構成了統治全國的網絡。王既是宗族領袖，也是政治領袖，有財產支配權和主祭宗廟的特權^⑧。

血緣關係，在中國社會歷史中或明或暗地一直起着作用，這是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一個極重要的特點。

考古學上所見血緣關係，從氏族社會母系制如仰韶文化的半坡遺址、姜寨遺址和元君廟遺址中都可表現出來。仰韶時代晚期男性祖先崇拜已見端倪，如陝西寶雞福臨堡和華縣泉護村遺址出土的陶祖、石祖。到龍山時代末期父系制和私有制確立之後，血緣關係更集中地反映到祖先崇拜上。商人最重祭祀祖先，幾乎天天都要祭，卜辭中祭祀的內容占了很大部份。西周宗法制對祭祀祖先有嚴格的禮制規定，人死之後，入葬家族墓地時仍要按昭穆次序排列墓穴。

嚴格地說，中國沒有像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那樣的宗教，只有原始的自然（天、日、月）崇拜，對土地（地、山、川）的崇拜和祖先（鬼、神）崇拜，特別是祖先崇拜高於一切，一直延續到近代。自西周以來的歷代帝王皆以“天子”自居，除了祭祖先、天地之外，對其他宗教，只要不危害其政權利益，皆可容納（但決不可能成“國教”），否則便可用皇權予以禁止。外來宗教傳入中國後，也必須向中國傳統的“孝道”妥協，造出《父母恩重經》來。這種情形，皆根植於血緣關係。不清楚這個特點，便很難理解中國社會和文化中的許多事情。

六

宗法封建制的西周，是中國文明社會早期的繁榮時代。但是，在繁榮的背後，卻蘊藏着不符合歷史發展的因素，即以血緣紐帶為基礎的宗法封建血緣政治，在世代更迭，親疏分派的情況下，宗法封建制已逐漸失去了它本來的血緣親密關係。諸國林立，各行其事，西周王朝的血緣政治已不能統治全國，諸侯霸國興起，僭越禮制，禮崩樂壞，在東周考古學上可以舉出若干實例。正在此時，秦崛起於西方，從公元前四世紀開始，秦獻公和秦孝公勵精圖治，任用商鞅，改革變法，向西周以來的血緣紐帶宗法封建制發起了攻擊。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繼承了商鞅變法的傳統，廢除封建制，設立郡縣；統一文字、度量衡和貨幣（半兩錢）；開馳道（統一車制），築長城；設立行政、司法和軍事三權分立而統於皇帝的中央集權制。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次空前的重大變革，它給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封建血緣政治以沉重打擊，建立了中央、地方各級政府管理的地緣政治，被稱為是中國血緣紐帶組織的第一次“解紐”^⑦。西漢劉邦稱帝後，囿於反秦等具體情況，屈服於六國舊貴族的復國要求，既封異姓王，又封同姓王，違背了歷史發展趨勢。經文、景至武帝，通過削地分國、諸侯王不得治國，施行推恩、左官、附益、酎金之律，進一步削弱諸侯王國的勢力。所以說，秦始皇的統一大業，最後是漢武帝完成的。

考古學上所見東周社會的劇變，已如前章所述。秦始皇和漢武帝在文化上的一統，也已被考古學的發現所證實。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沒有秦始皇的統一，中國很可能會像歐洲大陸一樣，形成若干小國。但是，統一必須有深厚的文化為共同的基礎，西周的華夏文化和秦漢文化，都是中國統一的堅實基礎。

中國文明的形成，經歷了一百多萬年的歷程。到公元前三世紀秦統一時，纔走完了它的漫長的先秦時代。秦漢以後的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七

綜上所述，中國文明的形成及其特點是：

中國文明的形成是自身發展的，是土生土長的原生文明。中國文明的經濟基礎是農業。與農業有關的科學技術得以發展。中國文明起源和文明社會誕生

之間，經歷了大約兩千年。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同步發展。

商、周是中國早期文明社會的繁榮時期。以宮廟為主體的城市，以玉和青銅製作的禮器，是中國早期文明社會的標志。

中國從氏族社會進入文明社會時，並未削弱氏族社會的血緣關係，卻以血緣關係為紐帶，與政治相結合，構成了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實行血緣政治統治。祖先崇拜是牢固的血緣關係的反映，從商周以來便成為中國宗教的主要形態，而且一直影響到後世。

秦始皇統一，改血緣政治為地緣政治，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這對中國歷史文明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貳 中國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最近一二十年以來，世界古史研究上的大事也許很多，其中意義最為深長的，是我們對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的經過有了比較深入確切的了解；從這個了解去看世界古史，我們又能看到人類文明起源史上的新規律。從這新規律出發，我們對今日的世界又可能增加一層新的認識。

中國古史的新局面，是從好幾個方面的學術進展所開闢出來的。這中間最要緊的進展是考古學上的。中國各地大量的新發現、新研究，使我們具體地知道了中國文明起源的經過，和每一個階段的歷史與內容。另外，在古文字的研究上也有突破性的進展，如周原甲骨的發現、商周爻卦符號的發現和新研究，以及對商周王制、都制的新看法，等等，都是過去所未見的。其中對古代美術品上面動物紋樣的意義的研究，尤其對中國古代宗教和政治之間的關係的了解，有突破性的作用。

這一類新的研究的結果，使我們充分了解到一件事實：中國古代文明社會的產生，也就是說有城市、有國家、有文字、有偉大藝術的新社會的產生，不是生產技術革命的結果，也不是貿易商業起飛的結果，而是逐漸通過政治程序所造成的財富極度集中的結果。具體地說，這種政治程序的成份包括：宗法制

度所造成的政治等級，宗族與武力的結合，以戰爭為掠奪征服的工具，獨占巫師用以溝通天地之法器的藝術品，等等。

由於中國古代從野蠻社會邁入文明社會的過程是經過政治程序，而不是經過技術革命和資源貿易的程序，因此，文明的產生在中國並沒有造成人與自然的關係上根本性的變化。就意識形態上說，中國古代文明是文明產生以前的同一個框架之內繼續發展下來的，其發展過程並沒有破壞原來的意識形態框架。用杜維明先生的話來說，中國古代的宇宙觀的一個基調便是“存有的連續”：

瓦石、草木、鳥獸、生民和鬼神這一序列的存有形態的關係如何，這是本體學上的重大課題。中國哲學的基調之一，是把無生物、植物、動物、人類和靈魂統統視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關，乃至相互交融的實體。這種可以用奔流不息的長江大河來譬喻的“存有連續”的本體觀，和以“上帝創造萬物”的信仰，把“存有界”割裂為神凡二分的形而上學絕然不同。美國學者牟復禮（F.W.Mote）指出，在先秦諸子的顯學中，沒有出現“創世神話”，這是中國哲學最突出的特徵。這個提法雖然在西方漢學界引起了一些爭論，但它在真切地反映中國文化的基本方向上，有一定的價值¹⁹。

中國文明的特點是，它是在一個整體性的宇宙形成論的框架裡創造出來的，但我們的意思並不是把意識形態作為前進的主要動力。意識形態只是重新調整社會的經濟關係，以及產生文明所必需的財富集中的一個主要工具。具體的講，文明產生的必要因素如下所述：

1. 在考古學的文明上所表現出來的財富之集中，並不是藉生產技術和貿易上的革新這一類公認造成財富的增加與流通方式而達成的。它幾乎全然是藉生產勞動力的操縱而達成的。生產量的增加是靠勞動力的增加（由人口增加和戰俘掠取而造成的），靠將更多勞動力指派於生產活動和靠更為有效率的經理技術而產生的。換言之，財富之相對性與絕對性的積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達成的。

2. 作為政治程序占有優勢地位的一項重要表現的事實，是貿易主要是限於寶貨的範圍之內，而戰略性物資的流通常以戰爭方式加以實現。

3. 由於財富的集中是藉政治的程序（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而不藉技術或商業的程序（即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上）造成的，連續性文明的產生能夠在連續下來的宇宙觀的框架中實現。

4. 事實上，現有的宇宙觀以及社會體系正提供了政治操縱的條件。那操縱的關鍵在於社會與經濟的分層，在中國，這種分層包括宗族分支、聚落的等級體系（導致城市和國家）和薩滿階層以及薩滿法器（包括美術寶藏）的獨占。祖先和神居住在上面的層次。生人經由薩滿或薩滿一類的人物，藉動物伴侶和法器——包括裝飾着有關動物形象的禮器——的幫助與他們溝通。在像中國這樣把祖先或神的智慧的賦予與統治的權力之間劃等號的文明之中，對薩滿服務的獨占與美術寶藏（亦即薩滿法器）的占有，便是社會上層人士的必要條件。

中國文明形成過程中的第二個特點是它的連續性。中國文明產生之後，我們在文明社會中發現了很多所謂“蒙昧時代”和“野蠻時代”文化成份的連續。最重要的連續是生產工具。中國青銅時代文明的產生，在生產工具上並沒有明顯反映出由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這一重大歷史變化。石、木、骨、蚌仍是生產工具主要的原料。青銅在這個文明社會中主要用途不是制造生產工具，而是制造與政治相關的器物。《左傳》裡有句名言叫做：“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國古代青銅的使用就是圍繞這類“國之大事”而展開的。用於祭祀的是大量青銅禮器，用於軍事的就是各種兵器。這樣，從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中國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連續是相當明顯的。

再一個例子是中國的古代城市與以前氏族社會中聚落的連續性。這就是中國古代的宗法制度，它是中國文明時代的親族制度和國家統一的產物。氏族或宗族在國家形成後，不但沒有消失、消滅或重要性減低，而且繼續存在，甚至重要性還加強了。《左傳》中講的封建制度，就反映出中國古代親族制度、氏族制度、宗族制度和國家政治之間的統一關係。

另一個例子是文字上的連續性。儘管在文字起源方面還有許多問題要討論，但可以這樣說：作為中國文明時代重要特徵之一的文字，它的作用是與政治，與親族的辨認，與宗教儀式等密切相關的。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文明時代的文字，是陶文在野蠻時代的主要作用在文明時代的延續。

至於在意識形態上的連續性，我們在上面已有所闡述。